

荐书堂

主办单位：济宁晚报 济宁亚龙书城



大湖西 (连载)

杨义堂

在徐州及周边地区陷落之后，苏、鲁、豫、皖四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变成了敌占区，中共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管辖黄河以南的山东全境和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所辖的地区，至此，湖西地区归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领导。

7月下旬，新的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看到徐西北和鲁西南的抗日武装已经联合在一起，于是撤销原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将郭子化同志调任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统战部部长，将徐西北区委与鲁西南特委合并在一起，组成中共苏鲁豫特委，因为地处微山湖以西的地区，也称湖西特委。战争时期，部队的政委和党组织的书记同样重要，边区省委领导指示，中共苏鲁豫特委的领导人是“非王即郭”，就是在王文彬和郭影秋中选择一人担任书记，另一人可以担任部队的政委，让特委委员自己投票选。

通过选举，王文彬任特委书记，郭影秋任委员兼二总队政委，白子明任组织委员，孙衷文任宣传委员，张如任军事委员。

从此，湖西地区不但有了统一的抗日武装——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而且有了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湖西根据地初具规模。

在新的苏鲁豫特委的领导之下，湖西各县的党组织又有了新的发展。陆续建立起丰沛鱼中心县委，郝中士任书记。下辖四个县委，一个是丰县县委，书记为孙兆立，一个是沛县县委，书记郝中士兼任，一个是鱼台县，郭耕夫任书记，一个是沛滕边县委，主传珍任书记；建立了金单曹中心县委，李毅任书记。下辖三个县委，一个是金乡工委，书记为王鉴览，一个是曹县县委，书记为王健民，一个是单县县委，书记为张子敬；萧县中心县委，书记为戴晓东，后为李砥平，下辖萧县、宿西、永北、夏东、砀南五县；萧铜工委，又称萧北工委，书记为周峰；宿县县委，书记为李时；1939年3月建立铜北县委、邹西县委、砀北县委，王家襄、丁

平、李庆瑞分别任书记。再加上原有的郓城中心县委和永城工委，在1938年7月下旬至1939年5月，中共苏鲁豫特委领导的党组织有4个中心县委，10个县委，2个县工委，其管辖范围扩展到苏鲁豫皖20余县，特委的中心活动区则是在江苏丰县、沛县，山东鱼台、金乡、单县，特委驻地在单县东南的张寨一带。

苏鲁人民第二抗日义勇总队成立以后，各大队立即按照总队的部署，分别与驻守当地的日寇“打一仗”，显示一下共产党抗日队伍的威力。

1938年7月2日，田野里的高粱已经半人多高了，单县第八大队教导员高文甫得知日军一支100人的部队沿砀山到单县公路进犯单县，高文甫率领单县第八大队火速赶往马良集，在道路两旁的高粱地里进行埋伏，并派人去通知在丰县李新庄的二总队和黄体润的国民党丰县常备队。在日军队伍刚进入我军的伏击圈时，到丰县求援的人回来报告说，李贞乾带着二总队已经赶来了！

高文甫一声令下，游击队员突然从青纱帐中杀出，李贞乾率二总队第五大队、第六大队、第七大队、第九大队、第十三大队和砀山游击队从后面也包抄过来，向日军猛烈射击，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敌人纷纷倒下。日军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摸不清底细，边打边退。这一仗，击毙日军六十多人，击毁汽车两辆。

马良集战斗打响了湖西区人民抗战第一枪，激发了湖西群众的抗日情绪，鼓舞了二总队指战员的抗日斗志，许多青年纷纷加入义勇队。

在李贞乾带着队伍胜利回到丰县李新庄之后，装扮成布贩子的陈怀玉又从萧县回来了，他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喜讯：萧县游击队端了日本的黄庙据点，在没有一人伤亡的情况下，打死了22个日本鬼子！

王文彬、李贞乾、郭影秋闻此喜讯都十分高兴，陈怀玉则绘声绘色地讲起了战斗经过。（未完待续）



“活在人生海海” 抒情散文丛书

如果你经常觉得生活像一场无止境的赛跑，焦虑、孤独、迷茫如影随形，小编一定要推荐给你这套“活在人生海海”抒情散文丛书。

“活在人生海海”抒情散文丛书，源自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海外版》历年佳作遴选。这套书收录了莫言、余秋雨、阿来等50多位作家的散文精华，每一篇都是对生活的深情凝视。读阿来的《抚摸蔚蓝色脸庞》，你会跟着他走过九寨沟的废墟与重生，明白“时间的伤痕终将被自然治愈”；读周晓枫的《他就是神骏，他就是猛禽》，你会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活着不是妥协，而是像鹰一样直面风雨。

当你翻开这套书，那些关于乡愁、亲情、自然的文字，会像老朋友一样轻拍你的肩膀说：“别急，慢下来，生活自有答案。”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曲阜碑刻(七十九)

明成化四年 重修阙里先圣庙 并御制庙碑记

王一驰

该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院，刻立于明宪宗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六月，高170厘米、宽95厘米、厚20厘米，碑额篆书“大明”。此碑由衍圣公孔弘绪、曲阜世职知县孔公锡竖立，碑文由经筵讲官孔公恂撰写。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便一直占据中国政治理论体系的核心地位。历代帝王大多受过儒学教育，明宪宗朱见深便是其中一例。朱见深尚为太子之时，便勤于儒学，圣裔孔公恂当时担任经筵讲官，为朱见深传授学业，“讲明二帝三王周孔为治之道”。长久的儒学熏陶使朱见深对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十分尊崇，碑文记载他每次参与经筵前都“执弟子之礼”于孔子。由此可见，早在即位之前，朱见深便有崇儒之心，这为他后来下令重修全国孔庙埋下了伏笔。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正月，明英宗朱祁镇驾崩，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改元成化。宪宗即位后随即颁布崇文尊儒的政策，大兴儒学并下令修缮各地孔庙，并重点关照了孔子故乡曲阜的孔庙。

事实上，后人对孔子的尊奉早已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末期鲁哀公为孔子修缮家宅。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鲁国国君便将孔子旧宅改为“寿堂”，保存孔子生前衣冠、琴瑟、书籍等，供人瞻仰祭拜，这是孔庙的雏形。但此时鲁人对孔子的祭祀更多带有自发纪念先贤的意味，无固定的官方礼制。到汉代，孔子的地位一路跃升。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195年经过曲阜之时，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开创了帝王祭孔的先例。后来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曲阜孔庙开始由国家维护。到隋朝时，隋文帝下令“州县皆立孔庙”，孔庙由此普及全国。唐承隋尊孔之风，太宗皇帝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尊孔子为“先圣”，玄宗时又加封孔子为“文宣王”。宋元时期孔子的封号继续上升，宋真宗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寓意为最高圣人。元代更甚，元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孔子受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大成”意为“集圣之大成”，这是孔子官方封号的最高级别。明代则对孔庙进行扩建，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修建北京孔庙，同时曲阜孔庙也不断扩建，形成了今天的规模。到了清代，皇帝开始更加频繁地亲临曲阜祭祀，其中乾隆更是八次南巡祭孔，是亲祭孔子次数最多的皇帝。历代王朝对孔子的尊

崇可见一斑。

明宪宗诏令既下，随即朝廷便令巡抚山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贾铨主持重修工作，目的是将阙里先圣庙“去故易新，用特瞻仰”。以按察司知事杨昇等为代表的众多官员亲自来到现场督工。曲阜孔庙的翻新工作从天顺八年九月正式开始，经过一年多的施工，于成化元年十一月修缮完成。曲阜孔庙是全国孔庙的代表，圣人故里孔庙的修缮工作是成化朝尊儒崇文的缩影。故而曲阜孔庙翻新工作完成后，就有相关部门提出重修阙里先圣庙，“诚一代盛典，不可无之，是以纪成功”，应该立碑纪念。不久朝廷便派巡抚山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杰前往阙里，最终选定在大成门以南、洪武与永乐年间旧碑东侧的位置立碑，相关工作仍由按察司杨昇监督。透过重修孔庙与立碑两件事可知，主持工作大局的都是都察院副都御史。

成化三年，纪念重修孔庙的碑立成。新碑高大宏伟，碑文强调了孔子之道的重要性，认为孔子之道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有不可缺”，是千万世都应遵守的常道。朝廷重修孔庙和立碑两件事，得到孔氏后裔的积极配合，其中，衍圣公孔弘绪、第五十五代族长孔克珣、曲阜世职知县孔公锡等人牵头立碑之事，并在成化四年完成了相关工作。

此碑竖立之时距今已近六百年了，虽间隔久远，物是人非，但人们仍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明代官方对孔子的尊崇。碑文对重修孔庙与立碑之事的记载，为今人触摸那个时代提供了便利，不禁让人感叹碑刻的恒久魅力。